

【思想文化史研究】

从“瞽叟通文”到“瞽目启明”

——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的盲人教育

周东华 汤方婷

【摘要】北京启明瞽目院是中国第一所近代特殊教育机构,其前身为瞽叟通文馆,由英格兰圣经公会的穆威廉创办,其“瞽目教育”给教养兼失的盲人们带来了身心上的双重福音。建校初期,学校旨在帮助盲生识字明道,传播基督教福音,而由穆威廉自创的中文盲字——“康熙盲字”,则为盲人识字提供了可能。1921年学校二度重开,受“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学校宗旨改为培养瞽目实业人才,职业教育突出,世俗化倾向明显。本文拟根据启明瞽目院历年报告,以基础教育、灵命教育和职业教育三方面为线索,以期展现启明瞽目院的教育内容与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勾勒出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基本范式。

【关键词】北京启明瞽目院;瞽叟通文馆;穆威廉瞽目教育;中文盲字

【作者简介】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汤方婷,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原文出处】《基督宗教研究》(京),2019.第25辑.199~226

傅步兰(George B. Fryer)曾说:“人类生活中受苦痛最深者,其惟盲人乎?”^①他们“童年瞽目,飘荡无生,坐向街隅,哀求衣食,以冀仁人之布施,延旦夕之余生,甚至竟日不得,势将就木。”^②鉴于此,近代以降,本着基督教博爱之心,西方教会陆续在中国兴办特殊教育。其中,被誉为“注意中国瞽目者之第一人”^③的英格兰圣经公会的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特殊教育机构——瞽叟通文馆(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即北京启明瞽目院(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的前身,正式拉开了近代“瞽目教育”的序幕。

对此,已有学者在其相关的近代中国特殊教育的研究中涉及,探讨了穆威廉其人、瞽叟通文馆时代的瞽目教育以及穆威廉所创的近代中国第一套汉语盲文体系——“康熙盲字”(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等^④,未能对启明瞽目院时期该校具体的教学内容及其实施情况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批从1909年至1939年启明瞽目院历年的英文年报,结合北京市

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案,拟对北京启明瞽目院的基础教育、灵命教育与职业教育及其成效等,作一详细论证。

学校简史:救赎之道、启明之路

有人说:“夫人不幸而失明,固不仅其个人不获一亲观友之笑貌,自然之景色,与夫欣赏艺术,自由行动亦受若干限制。抑个人为构成社会之份子,个人之不幸即可以影响社会之整体,斯个人之不幸之所以不宜忽视,盲人之痛苦应予以解除也。”^⑤如何解除盲人之痛苦?穆威廉遂建立了北京瞽叟通文馆。

穆威廉出身贫寒,父亲在一家锯木厂工作,在其九岁之时,一场意外使其丧失了左臂,不久他受雇成为格拉斯哥的乡村邮递员。穆威廉十分好学,他在空余时间里自学了诸多内容,不久便成为了苏格兰圣经公会的圣经贩卖员。穆威廉成功地做了七年的“圣经小贩”(A Bible Colporteur)后,于1871年来华,他很快学会了中文并十分受中国民众喜爱。圣经贩卖员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在街头闹市等场所沿街分发《圣经》,“在旅途中他为遇到的盲人数量和其不幸的

遭遇所震惊”，那时中国的盲人几乎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大多数的盲人因为疏于照顾很早便去世了，并且他们多以乞讨和说书谋生”^⑥。穆威廉同情中国盲人，认为盲人若被教以识字和实用的买卖方式，这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此外，他发现一些盲人有志阅读《圣经》，“传播福音是一项宏大工程，明眼者固然需要传道，瞽目者亦需要基督福音的洗礼”^⑦。于是他向差会发出呼吁希望帮助盲人，但没有得到回应，遂决定以一己之力来筹划“瞽目教育”。

关于建校时间，众说纷纭。第一种认为该校成立于1874年^⑧；第二种认为该校成立于1879年^⑨；第三种认为该校成立于1887年^⑩。根据该校年报，北京委员会会长鄂主教在前言中称：“1879年戈登·库明小姐(C. F. Gordon Cumming)来华，看到穆威廉尝试用布莱叶点字法教导盲生识字，遂立意辅助，回国后，躬亲募款。至1887年遂得于北京东城(甘雨胡同)设立小瞽目学校一所。”^⑪即学校乃是在库明小姐的捐助后于1887年建立的。虽亦有可能，但1879年库明小姐来华，这位著名的作者最初并没有将北京列为游历之地，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她在离京前来到了北京，“北京通”穆威廉就成了她的导游。穆威廉向库明小姐讲述了他作为圣经公会代理人所做的工作，也包括了他对盲人的兴趣，并希望设法教育人识字。心地善良的库明小姐被穆威廉的善绩与精神深深打动。于是，“夜深时她站在胡同(Fish Skin Lane)里的小密室敞开的门外，她没有看见任何东西，但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她被告知这黑暗中的声音来自四位盲人乞丐，他们正在读着《圣经》。”^⑫这里提及的胡同中的小密室，在年报另一处也有提及：“学校第一次成形是在北京一条偏僻的胡同里的一间又小又黑的密室之中。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关注它、听闻它、关心它。除了一个男人，他关心它、照看它、并为它祈祷，学校就这样开始成长。”^⑬因此，这间小密室可能即为第一个校址，显然它在库明小姐1879年的访问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穆威廉从事“瞽目教育”的开端，1874年亦是有可能的，这时学校带有试验性质，穆威廉在发明康熙盲字时的试验者王瞎子和乞丐盲童等四位盲人就是他最早的学生。

瞽叟通文馆建校之后，皆由穆威廉负责各类校

务。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所有在北京和中国北方的差会包括瞽叟通文馆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场动荡也使得穆威廉过度劳累而患病，1911年穆威廉病故，穆太太及其女儿担起了这份工作，其子则在苏格兰学习盲人教育。穆威廉和太太都希望儿子日后能够更好地子承父业，但随着一战的爆发，儿子奔赴前线，无法帮助母亲管理瞽叟通文馆。1919年，北京时局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学校经费不足，穆太太因多年的辛勤工作，感到责任过重、体力不支，遂选择辞职，学校也就停办了。

1920年，中西方人士深感自穆威廉所创“瞽目教育”应当继续开展下去，于是成立了新的董事会，邀请英籍牧师甘华德(Rev. W. Canner)作为第一任校长，接手瞽叟通文馆，改名为启明瞽目院。1921年，新校址购于北京阜成门外西八里庄村北，校长住所与男校亦于此年竣工，1923年又添设女生学校，1924年加添了男校的房屋并建健身室一所，1937年建立了新的教堂。

甘华德自1921年至1937年主持校务，其间只有1926年至1927年的两年中，因休假分别由斯利蒙牧师(Rev. J. A. Slimmon)和安德烈牧师(Rev. G. A. Andrew)代理校长一职。在这十几年中，启明瞽目院初具规模。“校长原定五年一任，只因办的成绩很好，所以连做三任。到民国二十六年，这位校长年岁很老，应当回国养老，所以才卸了任。”1937年，甘华德因病回国，聘请英籍传教士法克斯(Rev. C. R. G. Fox)为代理校长。1939年，穆威廉之子穆德明(Samuel Hill Murray)向英国委员会提出要求继承父业，成为启明瞽目院的下一任校长，“他对于此种教育尤其热心，并有深奥的研究，又对于学生很有爱德”^⑭。

1941年，穆德明在北京城沦陷区被日寇囚禁，学校由华洋义赈会接管，由一个叫何日的日本人兼任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京市社会局重新组织董事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都由张雨洲主持校务。

然“收容盲人之目的自非纯为消极的减除其个人之不幸，而为积极的予以精神之重建，使之疾而不苦、自励自强；予以知能之训练，使之残而不废、自力自助”^⑮。那么，启明瞽目院又是如何带领盲人走上

“启明之路”，如何实践其“瞽目教育”的呢？

基础教育：瞽手通文，体智并进

瞽叟通文馆建校初期，条件比较简陋，学生所用课本主要以传教为目的的圣经读本，读经、唱诗歌、学手工成为学生主要的学习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课程设置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具有初等教育的程度。据称“女生考试内容包括背诵圣经、汉语读本以及范本。她们用高低不同声部唱一首赞美诗歌，并且进行听写，所有这些她们都毫无迟疑的完成并没有任何错误。”此外，“男生考试内容包括背诵圣经、历史、地理、范本。他们也测试算术，结果较为成功。值得表扬的是，其他课程他们都通过了考试。”^⑩

相较于早期的瞽叟通文馆，二次重开的启明瞽目院在课程上并无太多的变化，主要包括有：“圣经、国文、历史、修身、地理、算术、实物教授、塑像学、体操、瞽目习字及手工等。”^⑪除去圣经课与手工课，剩下的所有课程笔者都将其归为启明瞽目院的基础课程。

盲童虽然没有视力，但这并不影响其他器官，因而“大多数在其他小学所教授的课程启明瞽目院也同样教授”，并且大部分盲童经过适当的启蒙教育后都能取得较好的智力与发展，“盲童看起来能够和那些有视力的孩子一样轻松且快速地阅读，起码可以说他们能够拿自己和任何普通的孩子相比”^⑫。如此的课程设置，是对盲童的一种尊重，是对他们学习能力的一种信任，也是注重学生整体知识层次的提高、人文的教化、心智的培养的一种教育思想。甘华德校长也曾谈到他会尽量保证学校课程与其他普通学校相同，这样“能够增加学生的自尊心，也能消除畸形的思想”^⑬。

在历年的校长报告中，谈及最多的当属瞽目阅读与习字，这也是学校基础教育中最为看重的一部分。穆威廉首创“瞽目教育”之时，必须先找到可供盲人学习盲文的“工具”，然而无论对于盲文或是中文，穆威廉都是新手。穆威廉在北京遇到了另一位格拉斯哥人——道觉先生(Dr. Dudgeon)，他的小女儿生来便双目失明。于是请来 Chouler 小姐教女儿学习布莱叶点字法。穆威廉在旁耳濡目染，很快就精

通了布莱叶点字法，他发现所有用字母写成的语言都可以用布莱叶点字法表示出来。在贩卖圣经时，北京当地人对穆威廉的中文学习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经过数年的试验和努力，穆威廉终于将北京的官话与布莱叶点字法相结合，创造了中文盲字，即“康熙盲字”。它乃是“根据布莱叶的六点盲字符型和《康熙字典》的音韵，以北京语音——当时中国的‘官话’为基准语言，整理了代表中国北方常用单字的408个字音，用40个数字符号组成408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两个数字盲符编成编码以表示不同的读音，并以前后两个盲符号位的高低去区分声调”。^⑭关于“康熙盲字”，学术界多有研究，在此不多赘述。^⑮

据称，该校中，《圣经》是最基本的教科书，到1894年，穆威廉已经将《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和其他一些章节用康熙盲字编辑成了识字和阅读课本。^⑯此外，借助“康熙盲字”，学生还可以学习音乐、地理、算术等课程。那么学校是如何教授识字的呢？

有一班在学习国语，他们的书籍，是他们用自己的手随时制造的，每人面前有一张厚纸，手里拿着一个不大尖锐的钉子，教师在上面念着的每一个字，他们都利用注音字母的拼音方法，用一种特殊记号，把它们一一打了下来，这一个一个的特殊记号，打好之后，他们用手一摸，便可以逐字念了出来，我让一个最小年纪十七岁女的孩子，用手摸着念我听，她微笑着，且念：“每人有两双手……”这证明了教育万能，盲人们可以以手代目，吸收宇宙间的一切智慧。^⑰

“康熙盲字”的学习十分简单，“几乎随便什么人，只要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去细读布莱叶初学课本上的短篇的导言，就可以掌握这个方法的原则。做完了这一步，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每个布莱叶符号头上或字头上所写的汉字的发音教给学生；当学生用手指摸着凸点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指出他所学的发音所代表的那个汉字了。”^⑱一名童先生这样介绍自己的经历：“当我刚来到这里时，我是一名盲人，但是现在我的心眼可以看见了。当我刚来到这里时，我不相信任何东西，但是现在我试验过基督教教义，并且我知道它是真理。所以现在我并

不是真的盲,因为我可以看到比我以前全部的生命都美好的事情。”^⑤触摸着凸起的盲字后,他补充道:你有但是只有两只眼睛,而我有十只。是的,“康熙盲字”无疑给盲人带来了另一种光明,十指成为了盲人的眼睛,借助触觉,他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通过一些参观者的记录我们可以一窥其教学效果:

这五十几位学生,包括男生和女生,全都显得很阳光很幸福,他们吃饱穿暖(他们所有人都是从北京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方的最贫穷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的),他们正在接受参观者的检验。他们所有人都能够流畅地阅读和书写,其中一位学生记录下了令人敬仰的马丁·路德所做的短演讲。而另一位之前被故意安排在外面的学生则被叫进来,将记录放在他面前时,他立马正确且流利地把它朗读了出来。一位在美国的学生被要求听写一篇文章,同样地另一位盲童被带进来朗读他所写的内容,而他也读的很正确。然后盲人读者说道:“你写错了几个音调。”情况就是这样,这时候他准确地重复了外国学生的错误发音!^⑥

启明瞽目院的基础教育一直在不断地创新与完善。学校早期因中国传统男女有别的思想,男校与女校分别由各自的教师上课。1931年,甘华德校长将四名年纪较大的男生和三名女生一起组成班级,由一位有视力的教师负责。“这个班级每天早上在健身房上课,他们看起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阅读材料非常现代化,我相信这是和当下的教育需求相一致的。学生们读的很流利,写的很轻松,并且学好了基础数学,他们也乐于开动脑筋,这是很值得感谢的。”^⑦而其他年纪较小的学生则几乎都由盲人教师负责。

此后,甘华德更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一场合作学习的教学试验,即不以性别为依据,而按照年龄与知识程度将学生分为四个年级:最高一年级即上文提及的班级。三年级的学生课表上开始有手工课,他们“在健身房由一位有视力的男性教师指导最重要的工作技巧,而其他课程则分别由各自的盲人教师负责。”二年级则“学习读写盲文和运用数学,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课程之一,分别由男性盲人教师和

女性盲人教师负责。”一年级则相当于一个幼儿班,关于这个班的教师也做过一些选择,“我们试过用男性盲人教师,但是他对于小孩束手无策。虽然只有三名小男生,但是他们会出现很多状况,对一个人的耐心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于是选择了两位女生作为教师,她们“将这份较为艰巨的工作完成的很好”^⑧。而1938年,学校正式创办了幼儿班,教师的工作也由两名盲女负责。

当然,教学过程中也曾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学生智力有限实在不能教育的,学校也曾将此类学生送回家。而对于课堂偷懒的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参加学习,不如说更倾向于把课堂时间作为宝贵的偷懒机会,这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普通孩子尚且会上课偷懒,更何况是一些可能从未见过书长什么样的盲人,“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并不知道书到底是什么,而算术更是一个前所未闻的秘密,它也没有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用途。”为此,学校加强了期末考试,“要求一大半的学生在学期尾声,或者说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加强复习之后进行重考。”^⑨学校要求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够修完所有课程,而一般学生在意识到学习的意义之后,也往往能够认真地参与学习。

在课堂学习之外,启明瞽目院于1931年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图书馆,主要通过复制书籍和从外面购买这两种途径以增加藏书量,所有书都重新用半皮革的样式装订,以提高它们的耐磨性。每年图书馆的书籍都在缓慢地增加,无论是规模还是其实用性也在不断扩大,直到1936年图书馆的建设基本完成。小图书馆的创建给盲生带来了许多乐趣,“每天晚上学习或工作结束后,图书馆都会开门,年纪大些的男生一周有三晚会使用图书馆,年纪小些的男生则自己要求在剩下的三个晚上使用图书馆。女生们则允许根据要求取出书本在自己的宿舍阅读。”^⑩图书馆对于盲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盲人读者来说,写的比讲的更有吸引力,如果能够通过图书馆来扩大他们的视野,增加他们的兴趣,这将是非常好的。”^⑪

此外,体育课是教会学校引入中国的,盲人因身体机能的缺陷,增强体质更是必不可少的。启明瞽

目院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其中多以游戏为主,亦可称为体操及游戏课。即使是寒冷的冬天,盲生们“穿着笨重的衣服,因而不大适合做一些剧烈运动,但是有一些运动是他们必须要做,也是可以做的”^③。不同于普通学校,盲人在体育锻炼上受到的局限不言而喻,因此凡是活动类的内容其实都可以纳入体操及游戏课,所以范围更加的广泛。体操及游戏课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一般在学生工作与学习之余的休息时间自由安排。这时候的盲生仿佛放下了一切,快乐而有活力,在1926年的代理校长报告中曾有一段形象的描写:

从12点至下午2点是休息时间。他们从教室里蜂拥而出,就像很多小牛犊被关了一整晚之后被放到绿野之上一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当属那些男生和女生快乐、活跃的精神面貌了,在远处看着他们参加虽然粗糙简易,却是全校男生都喜爱的游戏,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他们与正常的孩子有任何的不同之处。^④

盲生自身也十分热爱运动,“年轻一些的学生每天早上积极地参与锻炼,许多人更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早起后做健身操。”^⑤因经费有限,学校体育器材并不十分完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体育运动。但虽然是简易的器材,却可以让男女生都可以到室外进行必要的锻炼。1931年男女两校各设立了秋千和跷跷板,颇受盲生欢迎。校长与教师对此却十分紧张,“至今我们没有任何摔伤或是意外,但一些年轻调皮的男生做出的勇敢行为常常让我们屏住了呼吸。”^⑥男生们还喜欢踢足球,“固然踢足球必须要用眼睛的,球儿踢到哪儿,他们也是看不见的,可是他们将球装上了一个铃铛,踢时按着铃声追去,便乱踢一阵。”^⑦但是盲生的足球水平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校长在反思时猜测到:“也许是因为足球是自制的,所以不适合踢,这一点我不甚清楚,不管怎样,我们的足球似乎花在因爆裂而需修理的时间比在球场上的时间多得多。”^⑧

然而,散步是最受盲生们欢迎的锻炼方式,在盲生来校之前,散步无疑是一件完全洋人的东西。当然散步并不属于规范性的体育课内容,它乃是结合盲人的身体特征也本着节约经费的一种做法。学校

院子的中间铺设了一条环形道路,“这条路足够长以至于不会过分拥挤(大约8圈的长度有一英里),学习工作结束后几乎都有学生在这里散步。”^⑨盲生能够绕着这条路一圈一圈地走,不用担心会有磕磕碰碰的障碍物,“这似乎是他们唯一一项能够独立完成,也是唯一一项不存在兴趣消失阶段的体育锻炼。”^⑩天气暖和的时候,盲生“无论大小,都在这里散步”,“一些人每天都要走上好几英里。”^⑪

教师也会指导学生开展游戏活动,女校由北京英国教会学校(Church of England school)的导师负责,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男校则在选择适合盲生的活动内容与组织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组织的活动通常过于西方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组织自愿参加的游戏通常会经过一段时间就不受欢迎了,因为学生会逐渐失去兴趣然后退出;组织强制性的游戏也会失败,因为学生不会真正的用心参与。”^⑫

灵性教育:识字明道、皈依基督

基督教认为疾病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圣经》中也有大量对残疾人救赎帮扶的训诲。比如新约中的第一篇《马太福音》中写道: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⑬

《以赛亚书》中说道:“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⑭。瞽叟通文馆也将这句话写在历年的年报封面。这些固然也是为了强调耶稣神迹的存在以及信仰基督教的巨大力量,也体现了基督教对残疾人的救赎之道。宗教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教育,信仰以基督教的观点即是“灵命”的层次,信仰教育即培养“属灵的生命”。启明瞽目院是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宗教类课程的开设自然不会缺少,这类课程也在学校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早期阶段甚至处于中心地位。

穆威廉初创瞽叟通文馆时,希望盲生最大程度

地从事一些传教服侍的事工,学生“以学圣经和赞美诗为主要科目,也学一点劳动技能”^④。上文也已提及学校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背诵圣经、唱诗歌等,教师“只要给出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他们就能够立刻背诵出来”,而“学校盲女知道的圣经知识会让英国的女生们都感到惭愧”^⑤。其中有一名盲生,“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自身信仰的皈依,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去抓住他所理解的真理,在那几个月里,他为天国做了更多、更美好的事工,他所做的这些事远远超过六个外国传教士在许多年中所做的总和。”^⑥因此,学校认为这只是众多证明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传福音的证据之一。经历多年的发展,学校在传播教义、发展教徒方面颇有成就。年报提及:“所有在这片我们热爱的土地上的盲人,至少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因为所有被穆威廉先生聚集起来的盲人都曾是可怜的异教徒流浪汉,直到在充满爱的仁慈的影响下,他们无不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同时也有大批人成为传教使团优秀的代理人。”^⑦

从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就可以一窥学校灵命教育的成效:“有很多经穆威廉教育的盲生,现在已经成为传道者、教师和手风琴家。他们现在积极地参与基督教事工”^⑧。年报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吸毒成瘾的年轻小伙子,在他大约28岁的时候失明了,四处寻医无果后,他经传教士介绍来到了北京瞽叟通文馆。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了解了基督教,对于布莱叶点字法也很感兴趣,于是用心地抄写了大部分的《圣经》和赞美诗歌本上绝大多数的400首赞美诗歌。他有一副好嗓音,美国代表团的手风琴家教他唱了很多赞美诗歌,并送给他一支小风琴。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充满希望和阳光,回到医院后,他日复一日地给病人读圣经。^⑨在历年年报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学校自1921年改名启明瞽目院后,即使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之下,学校教育宗旨的侧重点开始逐渐偏向于培养瞽目实业人才为目的,但灵命教育依旧在日复一日地有序开展。甘华德认为灵命教育的具体内容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它并不是一件可以用数字去计算或是用尺子去测量的事情,他只是重复强调“相比于其他所有事

情,这部分的工作是最为必要的。没有它,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将根本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崇拜和赞美的事工,还有我们学习主的生命,这些确实帮助我们在面临各种困难的道路上缓慢前进”。^⑩1926年的代理校长报告中曾生动地提及盲生每日灵命教育的情景:

工作和教学遵行着往常的时间表继续进行着,每一天开始于早上7:30的查经,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均要参加。毫无疑问,盲生在圣经学习中有着真正的兴趣,中国教会中的普通会众可能看起来只是面无表情,正如任何一位苏格兰的会众一样,但是这些盲童似乎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学着控制他们的表情,我们能够看到当一些想法从他们的脑海中闪过时他们脸上扬起的微笑,也能看到当他们喃喃自语时嘴唇的活动,或是当他们理解一些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时恍然大悟的表情。查经结束后我们有晨祷,这个时候整个学校的所有男生和女生都聚在一起,祈求上帝赐福和眷顾这一天的所有工作……最后我们聚在一起进行晚祷,对上帝一整天的看顾呈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⑪

晨祷、晚祷、圣经课贯穿了每个盲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每周日下午还有自主圣经课,所有愿意参加的学生都可以参与,课堂也全部由盲生自己开展,他们对此十分喜欢并都积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自主圣经课经历了多年后仍然能够继续开展,这从某方面来说也表明了盲生对此信仰的坚定。^⑫周日晚上则有礼拜,“男生和女生都会到这里来,他们对礼拜很热心,我想我没有看过某次礼拜的会众比他们有更大的兴趣,表现的更好,或是唱的更充满激情的。盲生中的大多数人是基督徒,我也确信他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教义对于帮助他们使生活朝着更加明亮和快乐的方向前进做出了很多。”^⑬

此外,学校也有专门的音乐课,内容以宗教音乐为主,一来是教授学生一门生存技艺,二来则是更好的通过音乐来赞美上帝。音乐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国音乐,所有年幼的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学唱歌,“很多盲生似乎没有太多的音乐细胞,他们总是尝试把跑偏的调子拉回到正常的音调上”^⑭。但是

“这对他们真正学习用流行的方式唱歌是很好的,他们也完全地投入其中”^⑤。重唱法是所有盲生都非常喜欢的,当一首新的曲子教给他们时,他们会练习直到熟悉了所有不同的声部之后才会休息。也有一名年纪稍大的男生学习了一些钢琴演奏基础,他之前是一个非常容易发脾气孩子,而且一旦发脾气就会变得很不负责任,生气之后的一段时间就会很难相处。神奇的是,学习钢琴之后,他只要一弹钢琴就可以调整好心情,这大概就是音乐的魅力吧。音乐课的另一部分则为中国音乐,由一名优秀的中国音乐教师每周一次来教育盲生演奏乐器,他们组成了一支乐队。“在老师的指挥下,乐队演奏听起来很棒,但是单独教学看起来则有些奇怪,盲生喜欢一起待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站在自己喜欢的位置,演奏着不同的调子。”^⑥所有音乐课的教学成果在每年的圣诞节晚上最能一探究竟。对于基督徒来说,圣诞节可谓是一年中最为热闹、最隆重的敬拜聚会,启明瞽目院亦是如此。在圣诞节晚上,学生们唱歌、跳舞、演话剧,所有的点子几乎都是盲生自己想的,乐队则负责“配合演奏几乎所有的音乐,中国听众对此也十分喜欢”^⑦。

平时休息的时候,盲生喜欢弹奏乐器,唱着赞美诗歌,这似乎成为了他们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晚上是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正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有着各不一样的安排。乐器这时候开始奏响,口弦、长笛、六孔小笛、还有英国的六角风琴,有一位学生会先奏响一首熟悉的赞美诗歌,之后所有会乐器的学生一一加入进来。如果这是一首很棒的进行曲,就好比《基督精兵前进》一样,一些学生会来回踱步打着拍子,使得调子相当好的保持一致。其他一些人会绕着院子成双成对的边散步边聊天,或是和另一位学生玩摔跤,但是唱诗歌是唯一一件让他们所有人看起来最享受其中的事情。他们所知知道赞美诗歌的数量和种类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们会互相教对方他们所喜欢的歌。^⑧

笔者缺乏学校师生中发展为教徒的全面统计,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录。比如1927年时,“18名学生受洗了,年初的时候主教来了,那时有26名学生同意

并接受了‘按手礼’”^⑨。1933年,“有29名盲生已经成为基督徒,他们大多数都在20到30岁之间”^⑩,而这一年的在校生共有58名,可见有一半的学生皈依了基督。

灵命教育除了希望让盲生皈依基督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盲生的生活。盲生通过圣经学习以及在基督教生活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使得他们的心灵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盲生开始敢于直面生活,真诚地对待自己与他人。“他们来到这里时表现得相当沉闷,而且往往通过撒谎来掩盖自己的缺陷和失败”。^⑪基督教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自发地去认罪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学的事情,通过圣经学习,“那些犯错的孩子愿意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行为,并请求原谅,希望做一些改正,这正是我们所教授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⑫此外,“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别人信任的,于是反过来也开始相信别人,他们开始流露出喜乐的心情,他们也开始真正地想要努力地去过有用且坦率的生活。”^⑬具体举例来说,以前的每个圣诞节盲生都能得到水果、糖果和坚果,但是当他们知道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有很多穷人需要帮助后,他们要求这些花在他们身上的钱拿去帮助外面真正需要的人,“这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自发的愿望,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些小事的堆积就证明了他们的进步。”^⑭

职业教育:警目巧手、自食其力

几乎所有的特殊教育机构在成立初期就开设工艺课,瞽叟通文馆亦是如此。“学生们学习簧风琴的修理,年龄较大的学生则操作‘传统行当’,到街头演奏,学校还用‘布莱叶法’为明眼人印制乐谱,盲生们还参与音乐书籍的推销。”^⑮在特殊学校,此类课程是极其必要的,毕业生离校后从事的工作也多与此相关。

学校改名启明瞽目院后,学校宗旨改为“遵循基督教的思想来教育中国盲童,尽可能地通过学校开设的工艺课程,使学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⑯即以培养瞽目实业人才为目的,在校的每位学生都应该掌握一种以上的技能,以便将来可以自谋生计。

年报中提及“除去学校的常规课程外,每位男生

都有足够的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这就是手工课的主要意义所在。”^⑥因此,盲生根据年龄与能力可以分为三类:读书、学徒和全职工作。年龄较小的盲生每天在学校学习基础知识,提高自理能力。当盲生到一定年龄,就准备进入学徒期,即半工半读阶段。这时他们的学习任务将会大量的减少,他们可以到每一个部门去尝试,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这也可能是他们未来的职业。当然,他们也因此能够成为一支突击部队,若有任何一个部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能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待到技能成熟之后,盲生便被列入薪水名单,按劳分配所得,迈出自给自足最重要的第一步。

盲人的职业教育当然不同于普通人,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教学方法,“盲人虽视官机能丧失,其他器官技能,均较常人为强,惟失明年龄不同,视能丧失程度不一,故具有之工作能力,亦有差异。教授者,须先详加调查,因势利导,进步较速,若守诸定型,反觉扞格。”^⑦即应因材施教,拟定不同盲人的不同所需所求,甘华德也总结道:“工作必须开展得很慢,因为学生都是盲人,其中一些人甚至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东西,所以把正确的图像输入进他们的大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需要时间,因此我们不能一笔带过地教授,必须确认他们是否已经真正地理解。一旦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之后,手头上的工作将会进步得更加快速。”^⑧

1921年后,根据校长报告,启明瞽目院开设了多种工艺类课程,男校包括木工、纺织、制刷、柳器、制鞋、印刷,女校包括烹饪、编织和缝纫。

木工室:年报中多次提及这个部门对学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不但能应付本科的用度,即他科亦无不赖之”^⑨。在这里,盲工学习刨木头,使用锯子、木槌和凿子。据称,甘华德曾有一条一英尺长的铜尺,在英国它是被特殊制造以供盲人使用的,但盲生认为尺子太短就不再用它了。“他们为自己制作了一条3尺长的尺子,每英寸都标刻得十分清晰。他们将一条5英寸长的铁钉磨成合适的大小即成为标刻的铅笔。”^⑩用这些自制的工具,盲工就可以进行测量了。这个部门负责制作所有的木制品,主要是制

作木制家具,在空余时间盲工也会制作玩具,从智力拼图到五六寸长的玩具火车,或是大号的玩具小屋,款式多样,颇受顾客喜爱。此外,木工室也负责为家具或建筑物油漆上色,它也制作木制框架,“编藤室依靠这个框架才能编上藤条”,修理和制作纺织机也是木工的任务,它“成功保证了纺织室的器具供给”。^⑪

纺织室: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白棉布、帆布、毛巾、小羊毛地毯等等都在盲工的手下产生。有一位参观者如此描述到:“看着盲工做纺织前的准备,然后穿针,几千条的薄棉丝在他们手中来回穿梭,每根丝都能穿进恰当的地方,这真的相当令人惊奇,特别是当你看到可能是盲工因为粗心的操作而造成棉丝混乱的互相缠绕的情境时,他们也能很好的处理。在织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并把棉线的末端连接起来的速度也十分令人震惊。”^⑫的确,盲工看不到手中正在使用的任何一根线,也永远看不到他们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但他们都以一种极好的状态从事着这份工作。此外,甘华德要求纺织室“生产任何我们在市场上发现的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能够更轻而易举地使自己适应着去生产社会所需,而不是试着强迫人们去买那些市场上已经到处都是的东西。”^⑬他们总是在尝试一些新的产品,比如纺织有颜色、有图案的土耳其厚绒毛巾,碎步地毯、羊毛地毯、羊毛围巾等等。

纺织室在这十几年中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调整,1924年,学校增加了六间房给纺织室,这让纺织部门有能力去增加机器,1925年织布机就从最初的五台增加到了九台,与此同时,这也给盲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到处移动。1934年,学校将纺织室拆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主要的部门,包括十台织布机,全部交付给那些想要自食其力的训练过的工人。另一部分则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有一些织布机供学校的男生轮流学习织布的基本原理。”即工人负责生产顾客的订单所需,产品销售到外面以赚取相应所得。学习者编织的材料则全部供学校使用,他们“可以学习使用织布机的各个部分,因为各个部分都需要根据个人的不同特点来作出调整,缺乏调整将会导致纺织的失败,这也是他们经历

多次失败后所真正学习到的。”^⑥如此分班教学与工作可谓各取所需,互不耽误。这为盲生将来获准进入纺织室奠定了基础,届时他们的失败将很少是因为机械这方面的因为现阶段的学习让他们对任何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很熟悉,这帮助他们能立刻判断出任何错误所在,并能制定和采取一定的步骤去纠正。

柳器室:这个部门依靠木工室提供的木制框架,在框架上编织篮子和家具。这里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一名指导师,盲生也没有被教以任何超越基础藤条编织的内容,他们通常只是简单地进行模仿。但是,柳器室可以说是全校最需要创意的一个部门。甘华德记录道:“出于好奇,有一天我数了一下我们至今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产品,数量轻轻松松地就达到了40种。清单上包括一些用途迥异的物品,从简单的篮子到手推婴儿车和精致的带轮子的茶具柜。”^⑦有一次,该部门被要求制作一件时尚的编织沙发,这当然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或是听说过的。甘华德被给予了一张小照片,并被告知成品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在十分顺利地制作完框架后,一位盲童在其身边以另一种形式重复甘华德所做的事情,当他基本掌握以后,甘华德只需偶尔来检查一下,以纠正一些错误或是和他讨论如何避开一些困难。一位女士看到这张特别的沙发后,来到学校要求以同样的编织方式制作4把椅子,2张脚凳和2张桌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制鞋室:这个部门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用来制作启明瞽目院这个大家庭所需的鞋子,特别是一些小男生很调皮,很少能够安静下来的,因而鞋子和衣服磨损得很快,每年对此的需求都在大量增加。1929年,制鞋室增添了一台重型纺织机,用于皮革和帆布的制作。因此除去制鞋,这里也从事其他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所有繁重的帆布缝纫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男生的衣服是在这里制作和修补的,还有其他所有需要运用到重型缝纫机或需要额外使用大针的工作。”^⑧该部门也尝试过为家具重装椅面,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们用了大约289尺的帆布,将它做成床、椅子、包等等,这些材料都来自我们自己的织布机。”^⑨

印刷室:印刷室只有在需要书籍的时候才会工作,学校所需的书籍也多由此部门负责,只要有值得信赖的机器,这份工作是盲生可以胜任的,但学校的机器并不好,所以需要一定的监督,盲生才能够安全地使用它。印刷时,“盲生在浇版时先读出内容,再校样地读一遍,这些都是由盲生自己完成的。他们将每页纸装订成册,这样就能知道他们做了多少。”^⑩根据年报,该部门1923年制作53方印刷版,用此项印刷版刷印有430卷;1924年制作印刷版115方,刷印450卷及其他散篇书籍;1925年,制作114方印刷版,刷印490卷。后机器需要很大程度的修理,没有做任何实际印刷,但开始写各类的盲文抄本以期成立图书馆。

编织:女生们在她们的院子里穿针引线,编织短袜、长筒袜、围巾和毛衣,也为她们自己制作鞋子和布袜,修补和制作她们自己的衣服。这个部门由校长夫人负责,常年订单不断。当需要制作一些新的样式时,首先由校长夫人示范一遍,然后将其传授给女生们,她们将过程用盲文一行一行地写下来,再根据所记录的内容进行操作。年报中也谈及当她们使用新的配色时,她们会“准备好不同颜色的毛线球,每个毛线球都是大小不一的,以便她们记忆。这听起来十分简单,但如果我们也在这条生产线上的话,恐怕大多数普通人不久就会把它们搞乱,即忘记不同大小的毛线球代表着哪个特定的颜色。然而她们对此几乎没有困难,都能在正确的位置上作出必要的改变,运用正确的颜色。”^⑪而服装的制作自然需要不同的尺寸,只要清楚地了解方法和顾客的需求后,她们多半都能在恰当的位置作出调整。

编织时,女生们有着自己的暗号,“她们提及的颜色名称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不用说要去理解它们是什么意思了。”^⑫实际上,编织的秘诀是很容易掌握的,即使是最年幼的女生也能轻易地掌握其中的奥秘。年报中提及了这样一则趣事:

我们有一位五岁的小女孩在很久前就被人抱怨过,因为她发现其他人都用针和毛线制作一些东西,在做的时候会发出咔嚓的声音,于是她拿着针和包装着的毛线围绕着她们走来走去,让她们制作并发出咔嚓声,然后她就模仿

着,并且时而说道:“姐姐,我织漏了一针。”然而这并没有让她满足很长一段时间,她让那些年纪大的女生们不得安宁,直到她们教她做一些简单的纺织。^⑤

以上便是启明瞽目院工艺课的大致内容。学校的工艺课,乃属合作学习。所谓合作学习,即各部门互相配合,互相提供所需物品,以便最终完成作品。举个典型的例子:一张新椅子的诞生。椅子的木头框架是由木工室做的,之后交给编藤室,在木头框架的基础上开始编织,此后再交给制鞋室,在那里它被订制上了必须的靠垫和坐垫,这个垫子则又是纺织室提供的布料,最后再交还给木工,在椅子最终完成之前上漆着色,在这个过程中,男校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参与其中。而男女两校之间亦有配合,最普遍的当属纺织室制作的布料供女生缝纫成衣服。

陶行知曾说过职业教育乃“生利教育”,“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也;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也。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则有利于群则一。故凡生利之人,皆为之职业界中人,不能生利之人,皆不得谓之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⑥有人以此质疑学校的职业教育是将盲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将学校当作工厂的一种做法。

实则不然,特殊教育毕竟与普通教育不同,培养残疾人成为自励、自强、自给、自足的社会人才是教育的目的。1929年时,启明瞽目院的第一批学生已经离开课堂开始自食其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学校,而是他们不再依靠学校来支撑他们的全部费用。工艺课一方面锻炼了盲生的工作能力,为他们日后走向社会自食其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盲生与学校的经济收入,其平日的衣服、食物都来源于此。据称,“数年来学生均能于衣食自给外,尚稍有余资。工厂之管理与指导人员,均由学科教职员兼任,不另支薪。工厂系学生毕业后独立谋生之场所,厂中之生利,亦为毕业生之独得利焉。”^⑦那么启明瞽目院的工艺课到底是在赚钱还是在亏钱?年报中提及,“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原材料的

花费,以及卖出去的产品的总价值相比的话,我认为利润大概有15%。当然,我们还需要扣除工资(有视力的工人、还有自己赚工资的盲人)和伙食,这样的话15%是远远没有的。”^⑧可见,学校工艺课的收入并不十分乐观,经费不足也似乎是所有教会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盲生参与工作并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学校提供的工作岗位实则是盲生不可多得的一条出路。穆威廉创瞽叟通文馆,毕业生多从事宗教类事工,然19世纪20年代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学校世俗化倾向明显,从事宗教类工作的学生人数也明显下降,社会对于盲人从业仍有较大的偏见,启明瞽目院历年年报中也较少涉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倒是多次提及一些年长的学生迫切地想要离开学校,去寻求自由的出入,他们认为“在墙之外的社会铺满了金子,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到外面生活并捡起他们所想要的”^⑨,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比如在1933年,一名老生在离校后一年要求回来,“他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工作的机会,更不用说去开一间工作室让别人来替他工作了。”^⑩这位盲生在离开时曾信心满满地想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离校后,他甚至不能试着去做任何一件事,更不用说一个人成功地完成一件事。因此,特殊学校的职业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在那时,社会并没有提供给盲人足够的空间与机会去自食其力,同时,事实上盲人在没有正常人的帮助之下,很多时候也是无法完成工作的,要想真正实现自食其力仍有待努力。

结语

穆威廉在临终前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意在告诉人们:“他最欣慰的事情就是迄今为止无人触及的领域——‘瞽目教育’,其新的温床已经开启”^⑪。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启明瞽目院的教育事业呢?

首先,启明瞽目院可谓首开瞽目教育的大门,乃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滥觞,它亦同时使男女同校。它的“开办在中国特殊教育史上堪称一划时代的事件,它将中国中古时期单纯的残疾收养演进为近代的特殊教育,从此,比较正规的近代范式的特殊学校在中国开始出现。”^⑫穆威廉的“瞽目教育”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但学校早期的生源大多来自各处教堂,以

期培养为传教人才,相较于中国庞大的盲人群体,这显然只是沧海一粟。

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瞽目教育给原本流离失所、教养兼失的盲人们带来了身心上的双重福音,尤其是使得盲人从心灵上得到解脱,摆脱疾病的困扰,实现自尊自立。此外,启明瞽目院开办期间,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中国人,参观者络绎不绝。前文也有提及,对于盲人识字、盲人做工等场景,参观者都表示极为震惊,很多人甚至在参观完的第二天会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前来观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中国人对盲人的传统看法,消除了盲人的神秘感,减少了对盲人的偏见。同时,启明瞽目院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比如1909年中国教徒创办“保定盲哑学校”,1916年的非教会特殊学校“湖南导盲学校”,或是1927年中国第一所公立的“南京市立盲聋学校”等特殊教育机构的出现,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从教材到教具,从学校到社会等方面,实则都多少参照了启明瞽目院所提供的特殊教育的基本范式。

其次,学校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所有活动实则都是以传教和宣传福音为目的的。从学生的课程设置上看,宗教类课程占据了很大比重,前文已经有详细论证。瞽叟通文馆时期的课程主要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材的文学课,以弹唱赞美诗歌为主的音乐课和其他扫盲课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容基本阙如,毕业生也往往从事基督教相关的职业。启明瞽目院的“瞽目教育”也是宗教渗透的一种方式,它多少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学校对于盲童,免费提供衣服、食物和住宿,也不用上缴学费,这对于流落街头的盲人乞丐无疑是一个福音。相比于生存,宗教对一般盲人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再次,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教育与宗教的分离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深入,启明瞽目院不可避免地走向传教功能淡化、教育功能强化的方向,即世俗化与职业化的方向。上文也已提及,虽然学校的灵命教育并没有中断,但其重要性大不如前。就学校宗旨而言,穆威廉的“瞽目教育”之宗旨乃为“识字明道”。即希望中国底层民众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从而为更好地学习、理解、宣扬基督教教义奠

定基础。而1921年董事会确定启明瞽目院宗旨改为培养瞽目实业人才为目的,学校“二次重开时,学业不如第一次的成绩;但是工业比第一次特别有长处,在中国盲人工业,可算第一。”^⑤此时学校宗旨已从宗教转移到了职业教育,世俗化愈发明显。就学校课程而言,表现出了多样性和时代性,宗教类课程大大减少,手工课比重增加,课程设置尽量与普通教育接轨。1925年,学校增加了国文一课,“年长的学生每周有两次时间要学习孟子的著作”^⑥,这也打破了早期办学中往往被国人诟病不注意本国传统儒家文学的现象。

总之,穆威廉所创“瞽目教育”,其本质为传播基督教,进行宗教渗透。然而,它也拯救了无数盲人的生命,照亮了他们的心灵,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客观上为中国特殊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上),1929-1930年,第106页(肆)。

②[美]傅步兰:《盲童学校》,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第131页。

③Frank L. Norris, "Foreword", The Hill-Murray Blind Institute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2.

④举其要者:郭卫东:《北京瞽叟通文馆与中国盲文体系的初建》,《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黄加尼:《关于汉语盲文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徐玉达:《我国最早的一所盲校》,《现代特殊教育》1994年第6期,1994年12月5日,第42页。;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周东华:《瞽手通文明道:穆威廉与晚清中文“瞽目教育”的兴起》。

⑤《抄研复北平市刘文鑣条陈对于盲人福利问题意见书》,北京市档案馆J2-7-658,第9页。

⑥"William Hill Murray", Report of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succession to the Hill Murray Mission to th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in North China, Year 1921, Glasgow, 1921, pp.6-7.

⑦周东华:《瞽手通文明道:穆威廉与晚清中文“瞽目教育”的兴起》。

⑧ Mrs.Murray,"Mission to Chinese Blind in Peking",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318.

⑨ W.H.Murray,"Teaching the Chinese Blind",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302.

⑩ Frank L. Norris, "Foreword", The Hill-Murray Blind Institute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2.

⑪ Frank L. Norris, "Foreword", The Hill-Murray Blind Institute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2.

⑫ "William Hill Murray", Report of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succession to the Hill Murray Mission to th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in North China, Year 1921, Glasgow, 1921, p.8.

⑬ "William Hill Murray", Report of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succession to the Hill Murray Mission to th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in North China, Year 1921, Glasgow, 1921, p.5.

⑭ 盲人清:《记启明瞽目学校》,《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2期,第24页。

⑮《抄研复北平市刘文鏞条陈对于盲人福利问题意见书》,北京市档案馆J2-7-658,第10页。

⑯ 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3, Glasgow, 1914, pp.13-14.

⑰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11.

⑱ Rev. J. A .Slimmon, "Acting-superintendent's report for 192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6,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7, p.10.

⑲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8.

⑳ 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442页。

㉑ 郭卫东:《基督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周东华:《瞽手通文明道:穆威廉与晚清中文“瞽目教育”的兴起》等。

㉒ J. M. Allardyce,"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ese Recorder',"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V, No.10, October, 1894, p.503.

㉓《启明瞽目院看盲童生活》,《残不废月刊》,1948年第2卷第18期,第36页。

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767页。

㉕ 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3, Glasgow, 1914, p.11.

㉖ 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09, Glasgow, 1910, p.10.

㉗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7.

㉘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3",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3, Peking, 1934, p.11.

㉙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6, Peking, 1937, p.11.

㉚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37",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7, Peking, 1938, pp.20-21.

㉛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5",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5, Peking, 1936, p.18.

㉜ Walter Canner,"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19.

③J. A. Slimmon, "Acting-superintendent's report for 192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6,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7, pp.8-10.

④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5",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5, Peking, 1936, p.18.

⑤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17.

⑥介夫:《平西一个世外桃源,启明瞽目学校几十个小天使欢聚一处,半工半读之外还踢足球》,《北京晨报》,1937年1月18日。转引自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180页。

⑦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8.

⑧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7.

⑨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6, Peking, 1937, p.18.

⑩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19.

⑪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6, Peking, 1937, pp.18-19.

⑫《马太福音》,第9章,第27-30节。

⑬《以赛亚书》,第42章,第16节。

⑭徐玉达:《我国最早的一所盲校》,《现代特殊教育》1994年第6期,1994年12月5日,第42页。

⑮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3, Glasgow, 1914, p.14.

⑯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0, Glasgow, 1911

pp.7-8.

⑰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09, Glasgow, 1910, pp.4-5.

⑱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0, Glasgow, 1911, p.10.

⑲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3, Glasgow, 1914, pp.9-10.

⑳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0",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0, Peking, 1931, pp.13-14.

㉑J. A. Slimmon, "Acting-superintendent's report for 192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6,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7, pp.8-9.

㉒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9",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9,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30, p.13.

㉓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10.

㉔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20.

㉕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16.

㉖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16.

㉗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21.

㉘J. A. Slimmon, "Acting-superintendent's report for 1926",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6,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7, p.10.

⑤⑨G. A. Andrew,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Acting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27",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7,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8, p.12.

⑥⑩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3",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3, Peking, 1934, p.22.

①⑪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15.

①②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37",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7, Peking, 1938, p.23.

①③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4,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5, p.10.

①④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15.

①⑤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160页。

①⑥"William Hill Murray", Report of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succession to the Hill Murray Mission to th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in North China, Year 1921, Glasgow, 1921, p.12.

①⑦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4,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5, p.8.

①⑧《启明瞽目院现况》,《残不废》月刊1947年第1卷第9期,第12页。

①⑨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12.

①⑩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8",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8,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9, p.11.

①⑪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1.

①⑫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9",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9,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30, p.9.

①⑬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3",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3, Peking, 1934, pp.13-14.

①⑭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8",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8,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9, p.13.

①⑮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2.

①⑯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p.14-15.

①⑰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8",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8,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9, p.15.

①⑱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9",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9,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30, p.10.

①⑲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3,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4, p.8.

①⑳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2",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Peking, 1933, p.16.

⑧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4.

⑨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4",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4, Peking, 1935, p.15.

⑩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中国教育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第7页。

⑪北京市社会局教育科:《特殊教育》,《时代教育》,1933年第1卷第6期,第160-161页。

⑫C. R. G. Fox, "Report of the acting-superintendent",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9, Peking, 1940, p.13.

⑬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1",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Peking, 1932, p.5.

⑭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33",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3, Peking, 1934, p.7.

⑮The Twen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lliterate Sighted Year 1911, Glasgow, 1912, p.7.

⑯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58页。

⑰盲人清:《记启明瞽目学校》,《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2期,第24页。

⑱Walter Canner, "Superintendent's Report 1925", The Hill-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PA-LI-CHUANG Pek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5,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e, Peking, 1926, p.11.

Christianity and the Blind Education in Modern Peking

Zhou Donghua Tang Fangting

Abstract: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Beijing was the first spe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chool grew out of th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Blind, and it was founded by William Hill Murray who was from the Bible Society of England. The education for the blind really brought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ly gospel to the blind. In the early stage, the aim of the school was namely to learn the words and understand the truths, which was designed to preaching the truths of the Christianity as opportunity offers. Moreover, it used 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 which was invented by William Hill Murray as a learning tool. In the year of 1912, the school was modified. Because of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and the regaining education rights movement, the great aim of the Institute was namely to teach the blind children useful industries. Then the occup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Institute was valued, and the secularization tendency was highlighted. Based on the material from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and others, this article will use elementary education, spiritu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education as the clue to deal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content and effect of the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problem in it. After that, we can see the basic form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for Blind; the 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in Beijing; Christianity